

MAKESI
SHENGTAI WENMING SIXIANG
JIQI DANGDAI YINGXIANG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 及其当代影响

胡 建◎著



人 民 出 版 社

MAKESI
SHENGTAI WENMING SIXIANG
JIQI DANGDAI YINGXIANG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 及其当代影响

胡 建◎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崔秀军

封面设计:汪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当代影响/胡建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01-017256-9

I. ①马… II. ①胡… III. ①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B0-0②B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7146 号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当代影响

MAKESI SHENGTAI WENMING SIXIANG JIQI DANGDAI YINGXIANG

胡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75

字数:360 千字

ISBN 978-7-01-017256-9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系统阐释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当代影响的专著。本书立足于人类生态文明演进的整体历程，揭示了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出场语境”，梳理了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逻辑，确立了“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总体性，阐明了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生态社会主义”（亦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前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超越之处，及其与当代西方绿色运动的主流思潮“生态中心主义”的质底差异。此外，作者还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对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路进行了逐一梳理，对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生态文明思想的特征进行了符合历史逻辑的演证，对习近平时期“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实质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
(11BK006)

序 言

自从生态问题成为人类发展不可忽视的当代难题以来，对生态文明的研究成了世界性的显学。事实上，文明作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范型，与自然处于不可割舍的关系之中。从历史上看，文明大致经历了“人类屈从自然”的原始文明、“人类依赖自然”的农业文明和“人类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生态文明不是人类从诞生起就相依相伴的生存状态，而是现代人类在历经工业文明的岁月沧桑，饱受生态苦难之后的一种阅历、一份感悟；它蕴含着现代人类对历史实践的理性思考，也蕴含着现代人类渴望挽救地球家园、创建美好未来的真诚向往。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明已成为全人类普遍向往的未来愿景，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据此，本书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并借助这一思想的全球性影响，揭示其彪炳史册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吸取了在它之前的人类生态意识的成果——“生态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伴随着当代世界生态文明的主流思潮——“生态伦理学”——而发展。因此，厘清前（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生态学”、“生态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关系，对理解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重要的文化启迪意义。

本书第一章从探讨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开始,合历史逻辑地阐述了“生态学”的形成过程:发轫于18世纪的怀特的“田园主义”与林奈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争雄,发展为梭罗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因其不能脱离宗教束缚而难以成为“科学”的“生态学”,不能不被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所取代。达尔文的学说完全植基于科学实验并脱离了宗教意境,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的“生态学”。然而,发生于20世纪前期的“生态学”界关于“生物演替—顶级群落”理论的论战,通过论战双方在价值路向上的歧异说明了,人类研究生态问题不能仅限于“生态学”。因为生态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本质上体现着人类对自然对象的一种知解理性把握。它只以一种价值中立的冷峻态度寻求“求是”中的“是”,并不能满足人类根本性的生态利益。而人类根本性的生态利益乃人类对自身存在意义和价值取向的探源式追问和归本性回答,因此只能植基于一门以“求善”(“求好”——主体对自身祈求或向往的关系,它涉及价值的反省和与此表里的主体对客体的价值确认)为目的的人文科学,这种人文科学就是“生态伦理学”。依据这种价值逻辑,“生态学”不可避免地过渡至“生态伦理学”。

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是生态伦理学的第一个形式,它将西方近代社会的主流价值(启蒙价值)移情于自然界,得出了“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之理论前提,并据此论证了“生态中心主义”原则的彻底性。然而,生态伦理本质上是人的伦理,这使强调“生态中心主义”的“大地伦理”不能不生发出“无主体”的伦理责任悖论、“环境法西斯主义”的悖论、“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悖论。在这种境遇中,“大地伦理”必须走向“大地美德”,才能摆脱生态伦理学继续演进的困境。接踵而至的罗尔斯顿学说解决了利奥波德理论的“悖论”。它一方面从整体理论格局上认同“自然价值本体论”,并依据这一视角展开理论逻辑,因此从客观性的角度超越式地继承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说。但罗尔斯顿同时强调,人类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自然的存在有赖于人类评价及其对人类有益的方面。人类是文化的动物,他是通过文化实践而认知并体验自然的,人类据此确定了自身具有最高的生态权利与生态义务,并依据文化的尺度实行生态伦理。这就在事实上建构了人类主体性的“大地美德”。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顿

学说的本质是“大地伦理”与“大地美德”的合题。然而，继罗尔斯顿而起的生态伦理学家阿伦·奈斯却认为，罗尔斯顿的“合题”必然导致“生态中心主义”的不彻底性。于是，他提出“深层生态学”用以纠偏罗尔斯顿学说。“深层生态学”将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主流价值——“生态中心主义”——推上了“极点”——既是其正向度的极点，也是其负向度的极点。其正向度的极点说明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正面意义由此达到了顶峰；而其负向度的极点则标识着，西方生态伦理学的旨趣已从罗尔斯顿学说退化，若不实行“范式转型”，则面临丧失演进目标的绝境。而这种“范式转型”的最佳出路就是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因为从质底看，西方生态伦理学这种仅植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只能纠缠于“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论域，因此本质上是一种用社会意识说明社会存在的唯心主义学说。它不能从历史规律的角度说明人类生态意识形成的社会存在根据，自然也不能从必然性上剖析人类当下生产生活模式与生态问题形成的内在联系，更不能从不同人们生存与发展的不同境遇说明人与自然真实关系的本质，当然也不能根据历史规律指出解决生态问题的必然性出路。而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能够胜任这一使命，因为它在本根上是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成为西方生态伦理学合历史逻辑的超越式发展理论。

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依据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质底问题——生产方式、生活（主要是消费）方式以及作为二者之反映的生态意识——对西方前（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拾遗补正，并在演证过程中全方位地厘清了生态问题存在与解决的质底——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本根性差异。

在生产方式方面，马克思厘清了工业文明“劳动观”与生态文明的“劳动观”的不同视角。在工业文明的角度中，一方面，“劳动”乃人类借助科技改造自然以肯定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活动，因此，“劳动”对人类赋有永恒的本体论意义；这决定了由劳动创立的“生产力标准”具有“决定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地位。然而，另一方面，工业文明的“劳动观”是在不考

虑“生产的自然条件”前提下而得出的价值观，因此其价值只是在普遍性的“具体的抽象意义”上被肯定的。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具有人性悖论与反自然性的异化本质，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这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和人与人关系的对抗同时发展起来，资本在对待自然物时的压榨态度正像其对待雇用工人的态度一样，它把地球上的资源视为资金一样——是可以转变为利润来源的资产配置。树木、野生动物、矿产、水和土地都被视为商品，可以卖或者是进一步加工。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价格仅仅是榨取这些资源，把它们转化为市场性商品的花费而已。由此可见，资本主义通过工业化、市场化、技术化等方式所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财富增长总量，只不过是资本增长方式和资本关系扩张的同义语。换言之，“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就是“资本增长方式”，就是资本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全面渗透和全球统治的方式；这种无限的“经济增长方式”相对于有限的自然资源，是不可持续的。于是，马克思立足于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角度，将“劳动”重新定义为“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从中剖析出个人、社会、人类在这种“物质变换关系”中的应有地位，并提出了如何用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妥善处理这三重关系，以解决劳动的可持续性问题与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问题。而根据生态文明的“劳动”观，由“劳动”建构的生产力先进与否，取决于它能否与“生产的自然条件”良性结合。这就为人类从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转型为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指明了路向。

在生活（消费）方式方面，马克思的“消费观”也经历了由工业文明意义向生态文明价值的转型。依据工业文明的意义，“消费”的存在及其发展乃人类生产与生活不断持续与演进的内在“动因”，因此，社会生活的本质亦可视为消费过程，它包括作为社会劳动的生产消费过程与维持人的生存发展的生活消费过程；而人类历史就是沿循这种“生产无限发展→消费无限提高”的路向永恒进步的。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迅速累积，社会呈现出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过渡的趋势，“生产无限发展→消费无限提高”的传统目标呈现出其负向度价值。这具体表现为，当社会生产总量超出人们的生活需求范围时，导致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一方

面,大量的物质财富被生产出来,而且,将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被进一步生产出来;但另一方面,社会需求的饱和却导致大量社会财富过剩。如果不能使这些过剩的财富获得消费市场,则资本增殖无法实现,新一轮的扩大再生产也难以继。于是,刺激消费成为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重中之重,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并非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也即消费已超越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进入其具有的符号象征意义。”^①——也必然应运而生。“消费主义”在本根上是反生态的,因为它塑造了人类在工业文明中所具有的物质性消费的无穷匮乏感,从而使人为了克服这种匮乏感而无限地向自然索取,这迟早会使自然不堪重负而引发生态危机。马克思认为,“消费主义”的价值认同系统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于是,他通过对“三大拜物教”的批判,建构了生态文明消费观的未来展望:人类要克服“三大拜物教”,必须扬弃工业文明的“必要劳动”生活模式而实行共产主义的“自由劳动”生活模式,因为后者乃构成生态文明价值认同系统的社会存在条件。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就人类而言,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三大拜物教”失去了制度性保障,这为生态文明消费观的确立开拓了通途;就社会而言,由于“自由王国”取代了“必然王国”,使“生产无限发展→消费无限提高”的社会目标失去了规律性前提,从而必然让路于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就个人而言,由于“自由劳动”的生活模式超越了“必要劳动”的生活模式,使得“异化消费”失去了作为生活目的资格,从而必然被生态文明的消费观所演替。

在生态意识方面,马克思指出:“支配自然”的观点已成为现代西方社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价值观,因为它能作为“生产无限增长→消费无限提高”的幸福理念之保障。然而,“生产无限增长→消费无限提高”只是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认同系统,其质底是人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所以,它既赋有发展人类主体本质与生命活

^① 黄平:《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载陈昕:《救赎与消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动的正向度功能，也不乏造成生态危机而破坏人类生存的自然根基之负向度功能。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使人们在自然观上发生了彻底转换：从“服从自然”转而“支配自然”。这说明了，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发展理念不过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方式的同义词，“人对自然的支配”，实质上即资本关系对自然的支配，因为人只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在这个意义上，由“支配自然”观念演绎而来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可现实化为利己主义）的观念表达。而西方前（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试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框架的前提下，仅仅通过否定“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来解决生态问题，是不可能的。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工业文明的生态意识并不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人类的根本利益应植根于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因为它能用生态产业化的生产方式取代“资本逻辑”的生产方式，据此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上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态文明的人与自然关系构建的理论底据是，从“支配自然”的“人化自然观”重新复归“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之理论价值，并据此重新厘清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之意义——人与自然的双向互补价值；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关系之意义——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价值。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意识乃人类进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的更高发展阶段的生态意识，它可被称为“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所谓“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指称真正合乎人性的人，应当是与自然界完成本质统一、与自然本质上融合为一个整体的“生态人”。因此，合乎人性地改造自然界，也就是以合乎有机整体的方式改造自然界，以合乎世界本身的本真性改造自然界，使人类能够据此步入生态时代，完成生态文明。

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亦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实现生态学转向的当代主流理论之一。它立足于与马克思不同的时代背景，思考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生态问题。据此，它必然发展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不具有的创见。在质底上，生态社会主义用人与自然的双重关系与自然对人的双重意义的理论发展了马克

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在马克思的眼底，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实践论”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以外的自然物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它只有依赖于人的意识才能被规定，只有依赖于人的实践目的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因此，自然界在本质上是附属于主体（人）实践的客体存在。因为任何实践目的都是从人的利益出发的，是按照“人想要的就是最好的”这个价值原则行事的，所以，自然的价值主要被看作满足人的需要（包括生态文明的“生态需要”）。而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与自然之间不仅存在着“实践论”关系，还存在着“存在论”关系。在“存在论”关系中，自然整体是人和所有自然物存在的基础，即人和其他自然物都只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只有依赖于自然整体才能存在。因此，主客体关系仅仅存在于“实践论”关系所指称的人与外部个别的自然物之间——人只能把个别自然物作为客体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物”。而在“存在论”关系中，人始终不能逾越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整体”（生态科学把它叫作“生态系统”）的界限，即人与其他自然物一样，都是在自然整体的统摄和决定之下产生、变化和灭亡的，因此没有主客体的区分。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整体的稳定平衡即“自然的就是最好的”，对于所有的自然存在物都具有最高价值，它同样标示着人的“类存在”的尺度。据此，人必须将“人想要的就是最好的”与“自然的就是最好的”相统一。两者的统一不是用其中之一去否定另一者，而是要把人局部的价值选择（“人想要的就是最好的”）放到“类选择”（“自然的就是最好的”）的决定与统摄之下，用终极性的价值关怀约束、规范、评价“人想要的”东西的合理性，减少局部的价值选择对终极性的“类选择”造成的危害，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本书以生态社会主义的著名理论家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为范本，深入剖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之处。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领域，生态社会主义使物质性的生产生活获得了文化的意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生态社会主义使“自然”获得了的能动性和自主性的规定；在社会主义研究上，生态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

生态社会主义的质底是对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超越性发展的事实，说明了它的本质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而不属于当代世界绿色运动的主

流——以“生态伦理学”自诩的“生态中心主义”范畴。从本根上看，“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差异乃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在生态危机的成因上，“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正是建立在现代主体性哲学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造成了人类和自然之间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据此，它要求解构人的主体性。而“生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主体性地位，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第二，在生态危机的本质界定上，“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正是现代理性主义导致了生态伦理异化，诞生了反生态的科学技术，这是生态危机的本质，据此，它对科技发展取敌视态度。而“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的生存模式。因此，人类不应反对科技进步，只应批判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运用及其造成的异化生存模式。第三，在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上，“生态中心主义”反对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模式，要求根据“生物圈平等主义”来使人类回到前现代的服从自然的生活模式。而“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以克服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需要发展生产力和增长经济，只是这种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因而，它将是有益于生态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戴维·佩珀语）。

生态社会主义沿循马克思的思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生态意识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建构”。

在生产方式方面，生态社会主义从批判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非理性运用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的反生态性：第一，从源头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存境遇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形式是市场经济，它决定了企业只有在市场竞争中获胜才能存活，这必将驱使每个企业都必须无限地扩张与增长，否则就要在竞争中被淘汰。因此，企业在开始投资行为时就不能考虑生态利益，因为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和规避投资风险而具有注重短期投资回报的特点，但是环境保护和环境恢复则需要长期规划，因此，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与“冷酷的资本

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第二，从目的看，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态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反生态性。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和实现资本最快的增长，掠夺最多的资源和消费最多的商品是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两个根本支点，这也是资本主义物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据此，“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模式遂成为工业文明的必然选择。资本家和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只会考虑如何使用更多的自然资源，把人变成消费机器，而不会考虑那些有关人的健康、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公益性支出”。第三，从过程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经济是自由放任、高度竞争的经济，这必然会伴生两种现象。一是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而尽可能地压低生产成本；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将企业的成本转嫁给自然和社会而实现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采取掠夺和污染自然的方式。二是这种经济体系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发重复制造等资源过度浪费现象。第四，从后果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模式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是与资本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联系在一起的，它决定了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提高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会努力促使经济增长，而不会把维护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放在物质经济增长的目标之上，用以约束对自然资源的耗竭行为、对生命维持系统安全的破坏行为。生态社会主义对此提出了“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策。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源头境遇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主张，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而且涵纳“生态生产”。其二，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形态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劳动生产的目的不是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三，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机制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认为，应采用“混合型”的经济模式来发展生态生产。其四，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后果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海示，应在分清生态责任的前提下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

在生活（消费）方式方面，生态社会主义指出，在工业文明前期的“生产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生产，是持续改善和更新生产条件和基础设

施。为此，社会激励人们努力劳动以创造财富，并以培育兢兢业业、以工作成就作为最高奖赏的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者为己任。然而，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消费社会”，社会以刺激人们的无限消费作为发展动力，它依靠媒体建构起“消费主义”价值观并使之成为主流的“幸福观”。此时人们对商品的消费，已不再仅仅满足于使用价值的层面，而是更多地赋予商品以符号化的象征意义。即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再以满足生活需求为目的，而成为向他人显示自身的社会身份、经济实力以获得虚荣心和自我满足的一种手段。这样，人们实质上得到的是一种“虚假的满足”，一种“痛苦中的幸福生活”。因为“消费主义”的幸福观是一种“他者性”的幸福观，即幸福的源泉取决于外在的消费品供给，这样，当自然生态（外界的他者）因不堪重负而不能永远提供人类无限消费的物质时，“消费主义”的幸福也就烟消云散了。不仅如此，“消费主义”还会造成个人人生意义的异化、社会生产目的与消费手段的异化、自然从生存根基到牟利工具的异化。依据这种视角，生态社会主义指出，取代资本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应改择马克思的“自由劳动”作为“自为性”幸福观（所谓“自为性”幸福观，指称这个活动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是以自己作为目的，自己便是自己存在的理由——自身本质的展开便是幸福）的内容。其重要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个人只有选择了“自由劳动”的幸福观，才能克服“消费主义”所导致的幸福的异化；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人们只有选择了“自由劳动”的幸福观，才能复归正常的“生产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只有选择了“自由劳动”的幸福观，才能从源头上解决生态问题。

在生态意识方面，生态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对“支配自然”价值观剖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剖析。它指出：“支配自然”的理论理路内在于千百年来的人类理性，而今天又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实践理路相契合，因此，它演化为意识形态乃顺理成章之事，而它的负向度功能也是根深蒂固的。现代人认为，自然不过就是物理实在的总合，物理学规律就是自然的根本规律。而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可无限穷尽自然奥秘并掌控自然，这决定了科技理性能够保证人类自由范围的无限扩展，直至可以在宇宙中为所欲为——人人都享有永不知足地从自然中追求物质财富的权利。与此相应，经济增长是个人幸

福和社会福利的唯一源泉，人生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拥有尽可能多的金钱和占有尽可能多的科技含量高、设计精美的“难得之货”。而当这套理念成为主流思想时，以赚钱为主要人生旨趣的人们的便成了社会中坚，于是，“资本逻辑”成为制度建设的指南，“成本—收益计算法”成为多数人在多数场合中行为选择的指南。几乎所有前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和制度都是反对贪婪、遏制贪欲的，唯独现代性思想和现代文明制度把贪欲视为创新和进步的动力。由此可见，以科学主义和物理主义为思想支撑的贪欲理念驱动下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质底原因。生态社会主义指出，人类克服“支配自然”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既不能是“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能是“生态中心主义”，而只能是马克思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由于“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也认为，人类“支配自然”具有不可避免性，于是，生态社会主义对“支配自然”的概念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其主要意思是，生态问题不是因人类“支配自然”造成的，而是因人类“支配自然的缺失”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社会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产生了生态问题，就不能说是成功地支配了自然；反过来，“只有一个能够控制自身在自然环境中活动的社会才配称为共产主义”^①。即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②。这就是说，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是同人的全面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进步相联系的，其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成功地支配自然。

最后，本书对“生态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进行了评估。在某种视角下，马克思主义也可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它以研究社会主义如何科学地取代资本主义之规律为己任。因此，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始终是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历史定位都取决于它对这一问题的贡献。在马克思的时代，由

① Reiner Grundmann, *Marxism and Ec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11.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

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尚未恶化到生态危机的程度，尽管马克思已经独具匠心地构建了自己的生态文明思想，但他仍然主要立足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私有制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的生存模式，他的贡献也主要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层面揭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规律。继之而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借助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消费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控制了人们的内心向度，使得人们的政治意识日益淡薄，兴奋点转向受广告所支配的消费中，社会生活出现了总体化趋势，个人日益被社会总体所吞没。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早期追求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目标，转换成如何使个人摆脱总体异化而获得自由、解放。顺理成章，其理论眷注于如何解构束缚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关系。尽管其中也含纳“自然的解放”之内容，但其韵致，一是指人的感觉从技术理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形成具有政治和解放功能的“新感性”，即人的自主意识，二是指自然从技术理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以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人内心世界的控制。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政治文化批判的理论，其本质与马克思理论的主流一致，都是立足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层面的社会批判理论。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由于资本主义进入了“消费社会”的新境遇，立足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层面的批判已难以在本根上解构资本主义。面对这种历史新格局，生态社会主义从更深层的“人与自然关系”入手，借助生态视角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模式进行了本根性批判，从而以新视角再次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合规律性。但是，由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眼光仅限于资本逻辑统治的当下世界，它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虽有现实意义，但与马克思立足于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相比，却有终极关怀境界上的不彻底性。

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之所以必然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路”，就是因为它的当代发展需要通过中国的具体实践来获得终极源泉。在一般的意义上，西方国家并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而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生态社会主义只能以“理论理性”的形态存在，不能进